

我们该如何研究英国资本主义的兴起?

李勇

(山西大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太原 030006)

摘要:英国资本主义的兴起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1640年爆发的英国革命既是该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也是思考英国资本主义兴起的重要切入点。自英国革命爆发至今三百多年,英国人不断寻找一种对革命与资本主义问题的合理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析方式于20世纪初传入英国,为英国人理解和解释英国革命与英国资本主义的兴起提供了崭新的视角。从英国人(尤其是英国左派)的百年探索来看,整体主义是审视英国资本主义兴起的基础性视域,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方式是基本手段,将资本主义兴起从单纯的经济范畴扩展到社会范畴是必要的突破,以史为鉴和连接传统与现实是基本目的。

关键词:英国革命;新左派;整体主义;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1505(2016)02-0055-06

How Do We Study the Rise of British Capitalism?

LI Yong

(Marxist Philosophy Institute,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China)

Abstract: The rise of English capitalism is a very long historical course, during which the English revolution erupted in 1640 is a crux and critical point for the reflection on the rise of English capitalism. The British have been persistently seeking some rational interpretation of revolution and capitalism since the eruption of the British Revolution about three hundred years ago. The British people attained a set of new perspective to understand and explain the British Revolu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English capitalism since the historical method of Marxism was introduced into Britain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In terms of the hundreds of years exploration by the English, particularly the new left, holism becomes a basic view of reviewing the rise of English capitalism; the historical method of Marxism is a basic mean; the necessary breakthrough is that causes of the rise of capitalism are expanded from simple economic category to social category and taking history as a mirror and connecting tradition with reality is the fundamental aim.

Key words: English Revolution; the New Left; Holism; Marxism

收稿日期:2015-12-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文化唯物主义的现代性批判思想研究”(13CZX020);山西省高校哲学社科研究一般项目“英国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群众’研究”(2015213)

作者简介:李勇,男,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副教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英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英国资本主义的兴起一直以来是学术界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尤其是在历史学,马克思主义以及经济学等领域。对英国资本主义兴起的时间、成因、过程、影响等方面的看法一直存在着争议,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对英国资本主义兴起的研究必须以17世纪英国革命为突破口和切入点。长期以来,这场革命的性质在西方学术界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马克思称这场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而传统英国社会称之为“清教革命”。所以,在弄清英国资本主义兴起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首先了解英国革命前的社会状况,更需厘清英国资产阶级最初有什么特征,又从何处得到这种特征。由此,我们须带着对这样的一些问题开始:1640年至1660年英国革命的本质是什么?是一场以宗教为主要特征的革命,还是一场英国宪政体制内派别间的冲突?抑或是一场马克思主义意义上权力从一个阶级转移到另一个阶级的资产阶级革命?宗教在16、17世纪的英国社会以及英国革命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一、“清教革命”理论的困境

直到20世纪中叶,英国的历史教科书对英国革命的定性一般沿用的是戴维斯“牛津英国史”的标准说法。这种说法首先认定17世纪的英国革命是一场宗教革命,同时宪政问题也是革命中的一个重要问题^[1]。加德纳在19世纪60年代对这种观点加以提炼并将“清教革命”概念首次推向了历史舞台。截止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清教革命”的概念几乎统治着英国所有学校的历史教科书。“清教革命”的阐释基于“人对传统制度的捍卫”。加德纳认为英国内战并不是一场阶级冲突,引导人们去战斗的不是阶级利益,而是根深于英国传统的美好理念。加德纳式的解读最大的缺陷在于严重低估了革命的社会与经济维度。并且,这种阐释理论的前提是:宗教意识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系统。这种理论前提来自经验,同时又很容易被经验证伪。

从20世纪早期开始,英语学术界对这套阐释理论的抵触情绪“与日俱增”^[2],尤其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英国革命的阐释理论被引入英语世界后。在这种背景下,20世纪30年代以降,英语学术界陆续出现了一些与正统观点相左的学术成果。最早在1915年,厄舍在“加德纳的历史分析方式”一文中指出加德纳的历史阐释存在着方法论上的不足。芝加哥大学的内夫教授认为早在1640年前的一个世纪里,英国就已经发生“工业革命”,这场工业革命对英国社会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并认为这场革命是加德纳完全没有意识到的^①。陶内教授在详细分析土地拥有阶级分裂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封建的”与“资本主义的”因素进行了区分。这种分裂在1640年前的几十年间迅速发展,分裂后的双方最后演变成了英国内战敌对双方^[3]。传统阐释理论的前提宗教意识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系统。以陶内为代表的历史学家不仅证明了这种前提的伪科学性,还阐述了清教主义与资本主义兴起间的联系^[4]。20世纪50年代开始,英国历史学家认识到多铎王朝的君主制是一种具有英国特有形式的君主制,它建立在各阶级的联合之上。国家与土地所有阶级联合挣脱了英国君主制的中世纪封建主义的束缚,挣脱束缚后的国家与土地所有阶级又与新兴的资本主义相对立^[5]。

传统阐释理论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遭到严重批判,最为诟病的是这种套阐释理论对导致革命以及革命中表现出来的经济与社会冲突的“视而不见”。在众多的反对声中,人们也逐渐认识到以前所谓的意识形态的斗争其实与阶级冲突存在着必然联系。虽然到20世纪中期,很少有历史学家还将英国革命定性为“清教革命”,但是又没法提供一种可替代的综合分析与解释的方法。

^①参见:J. U. Nef, *The Rise of the British Coal Industry*. London: Routledge. 2 vols. 1932; J. U. Nef, *Industry and Government in France and England, 1540-1640*. Cali: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40.

二、马克思对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勾勒

从上面历史学家对英国传统解释理论的批判中,我们能看到对经济与社会等因素的忽略是传统阐释理论的最大缺陷。马克思将17世纪的英国革命解释成资产阶级革命。这种解释可以看成是一种可替代的模式。马克思的资产阶级解释模式囊括了所有新要素,并给予了它们存在的合理性。在城乡兴起的资产阶级与旧有统治阶级及其国家形式发生了冲突;同时,新阶级的意识形态与国家教会的意识形态之间也产生了冲突。英国的资本主义主要集中在广袤的农村地区。在这些地区,一部分乡绅转变了土地的生产与经营模式,这种最早的农村资本主义与城市资本主义联合起来,把旧有的封建议会机制变成了他们表达与推动新阶级意愿的主要工具。到了1642年,下议院的多数议员与上议院的部分议员联合起来反对国王及其旧有的封建支持者。1640—1642年间,农场与城市联合的资产阶级便有能力领导一个几乎由所有社会阶级组成的联盟,国会成了联盟的最高权力机构,但这种议会形式的联盟存在着分裂的风险。在对国王的战争取得胜利后,这种联盟便分崩离析了,分裂后的联盟用“阶级斗争”续写了1645年至1660年间的英国历史。“宗教宽容”在这个时期扮演了极其重要的历史角色,它让下层阶级有了组织与言论的自由,“长老会”与“独立人士”间的斗争又超出了宗教冲突的范围,他们的冲突直指推翻封建主义的手段问题以及对军队的控制问题。而“独立人士”、平等派、深耕派间的冲突则完全是社会性的,他们间的斗争表明了革命性的小资产阶级和丧失土地的半无产阶级性质的农民等人借着革命在英国社会与历史中兴起。大资产阶级不得不面对这种改变了的现实。

马克思提供的阶级分析方式成了一种将所有革命因素放置进去的框架,这为日后英国人对16、17世纪英国历史进行重新阐释打下了基础^[6]。20世纪上半叶以来,英语世界出现了许多关于英国内战的优秀的史学著作,它们都在某些方面受到马克思主义方式的影响^①并且在某些方面挑战了传统的阐释理论。然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即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接受是一种折中主义的接受,除了英国新左派。

三、英国新左派的贡献

英语世界里,对16、17世纪的英国史进行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阐释最早出现在20世纪40年代。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1938年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很少用英文来撰写16、17世纪英国历史,而主要以俄语完成著作。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作品被译成英文的时间相对较晚。恩格斯的《德国农民的战争》一文直到1926年才有了英文版。早期的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巴克斯曾在19世纪末介绍过恩格斯的这种阐释方式^②,但由于巴克斯对学术界的影响甚微,他的介绍几乎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

在英国资本主义兴起这个问题的考证上,英国人需要一种全新的综合性的方式,即马克思主义的

^①这些作品中具有代表性的有:H. R. Trevor-Roper, *Archbishop Laud 1573-1645*, Macmillan, 1940; D. W. Petegorsky, *Left Wing Democracy in the English Civil War: A study of the social philosophy of Gerrard Winstanley*, V. Gollancz Ltd, 1940.

^②参见:E. B. Bax, *German Society at the Close of the Middle Ages*; S. Sonnenschein, 1894; E. B. Bax, *The Peasants' War in Germany, 1525-1526*; London: S. Sonnenschein, 1899; E. B. Bax,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Anabaptists (1894-1903)*, S. Sonnenschein, 1899.

分析方式。对马克思主义分析方式的直接继承者与创新者是英国新左派的史学家。英国新左派是20世纪50年代末在英国兴起的旨在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一批英国马克思主义者^[7]。1956年苏联入侵匈牙利,由于对英国共产党关于该事件态度的不满,许多史学家退出了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1946—1956),甚至退出了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随即解散。这些退出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的史学家成了后来的新左派史学学派的主体,他们与法国的年鉴历史学派,美国的社会科学历史学派并称为世界三大史学学派。

英国新左派史学在历史学领域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成就,在英国资本主义兴起这一问题上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有别于且有能力取代传统的阐释理论。虽然他们开端于对苏联以及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与反抗,但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方式首先还是来自于苏联,且早在新左派形成之前,他们就在这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正是早期的这些成就为新左派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确立了基本原则。第一部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马克思主义英国史是莫尔顿的《人民的英国史》(1938年第一次出版,中文版于1962年出版)。该书用大量篇幅以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式审视了16、17世纪的英国历史,第一次正式地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析方式介绍到了英国^[8]。同时期出现的具有代表性的著作还有林赛的《约翰·班扬》一书,该书勾勒了班扬与革命间的联系,尤其是他与平等派间的联系。另外,《平等派与英国革命》(1939)是英国历史上第一次以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全面考察平等派运动的专著。为纪念英国革命爆发300年,论文集《1640年英国革命》在1940年得到出版。该论文集开篇就由希尔简述了马克思主义革命观;第二篇文章题为“英国革命中的当代唯物主义阐释”,该文章是一篇主要研究温斯坦利、哈林顿与深耕派等人物与派别的作品;第三篇文章题为“弥尔顿:革命的知识分子”。这本论文集的主要贡献在于它开启了研究英国革命很多未解决问题的先河。在这些研究基础之上,人们开始认识到英国革命不仅是一场资产阶级的革命,也是一场人民大众的革命。换言之,与英国资本主义兴起相伴随的是英国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度使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的写作陷入停滞,但还是产生了一些影响较大的作品,如《伊丽莎白时期的食品政策与军事力量》让读者开始重新理解多铎王朝。1944年,汉密尔顿编辑并出版一本论文集,这本集子以温斯坦利为研究对象。从该论文集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温斯坦利是17世纪的一名乌托邦式共产主义者、深耕派领袖,他在1649至1650年间,曾尝试在伦敦郊外圣·乔治山腰的一块荒地上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社区,他出版过一些小册子来阐释他的历史与经济理论,还有他以阶级分析为基础的政治学。

迄今为止,与英国资本主义兴起直接相关的、最好的、专题性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是多布的《资本主义发展研究》(1946)。多布将英国革命放到大的欧洲资本主义兴起的环境下来考察,认为英国革命爆发的最根本原因是经济与社会的,而这些原因又集中体现为英国资本主义的兴起。多布指出,商业资本者完全可以在封建社会的缝隙中生存,他们不具有积极的革命意愿,他们对现存经济政治秩序的反抗是被动的。他们被动反抗的外力来自于新的生产模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在工业与农业领域的兴起。但从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来讲,真正的革命开始于土地转让与新的外交与帝国政策的实施。尤其是在1651年《航海条例》颁布之后,英国开始使用国家力量来抢夺市场,这一举措极大地刺激了英国的资本积累,这种积累为18世纪的工业与农业革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9]。

多布的著作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在英国马克思主义圈内引起了广泛而持久的讨论,并带动了一系列的研究。希尔正是在多布研究的影响下专文研究了16、17世纪英国的土地所有制与英国革命间的关系^[10]。莫森专文研究了《航海条例》对英国资本主义发展以及英帝国的重要意义^[11]。另外,多布对商业资本的分析在英国马克思主义圈内形成了关于都铎王朝君主制本质的热烈讨论,最终形成了对17世纪英国君主制的全新认识。1640年前,英国的君主制属于大陆式的绝对君主制,在这种君主制下,封建地主阶级是统治阶级。到了多铎王朝与斯图亚特王朝早期,这种君主制因其所依存的社会历史条件

发生的变化也具有了独特形式。1949年英国革命300年纪,莫尔顿等人编辑出版了论文集《英国革命的故事》,这本论文集论及的范围相当广,涉及革命对国家形式的影响,对帝国的影响,对教育的影响,对科学的影响,等等。

四、具体的研究理念

纵观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对英国革命以及英国资本主义兴起等问题的认识过程,我们既要注意到他们的错误,也需从他们所取得的成就中吸取精华,尤其要从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们那里发掘如何研究英国资本主义兴起的方法。

第一,必须要用一种整体性的分析方式来审视英国资本主义兴起这一问题。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为研究16、17世纪的英国历史提供一种整体性的研究方式。英国资本主义的兴起不是一个阶级的事情,而是整个社会的事情;不是十年或几十年就完成了的事情,而是英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不是英国独有的现象,而是应将其至于整个欧洲或全球环境下来审视^[12]。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种解读视角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几十年的发展给我们留下的最为珍贵的遗产。多布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希尔总结了这一时期的农业法规的变化过程;莫尔顿的《人民的英国史》与《1640年英国革命》早已将马克思主义历史阐释声誉远播;《共产主义评论》上刊登的“多铎王朝与斯图亚特王朝下英格兰的国家与革命”以及《现代季刊》所做英国革命三百年纪的活动都充分显示了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个时期经济变化与国家变化间的联系有很清晰的认识。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对英国历史的阐释模式直至今日仍然是不可替代的有效阐释,其阐释明晰度也是其他学派所无法比拟的。

第二,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式是我们研究英国资本主义兴起这一问题的重要手段,也是分析这个问题的方法论基础^[13]。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一致认同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早期集体成果的前提。如果没有统一的方法论,那些零散的知识就不能被综合起来。例如,最早在《共产主义评论》上刊登的“多铎王朝与斯图亚特王朝时期的国家与革命”一文就是集体讨论的结果;莫尔顿的《英国人民史》也是在集体讨论后于1949年出了一次修订版,该修订版的出版为日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研讨奠定了基础。随着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的人数增多,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果也实现了数量和质量上的显著增长。

第三,英国资本主义的兴起不仅是一个经济学概念,更是一个社会概念。我们必须将这个问题放到英国的社会生活中去考量,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出发来阐释这一问题。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将整体性带入历史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将16、17世纪英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融汇成一幅图景的可能性。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仅讨论了查理一世与克伦威尔,也重新检审了莎士比亚、弥尔顿、霍布斯、班扬等社会名流;他们不仅研究工业、农业与贸易等领域的变化与发展,而且还研究教育、科学、哲学等重要议题;他们不仅指出政治上层建筑的变化与经济变化有关,而且宣称意识形态的变化也与经济变化息息相关。此外,他们还将注意力投到了17世纪的文学、音乐、建筑等领域,将这些领域的变化发展与整个17世纪英国的经济社会背景相联系,并且在这方面的研究上取得了丰富成果^①。英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这种多维度的工作和思考方式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一项整体性的工作。当然,除了上述的这些问题,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例如,16、17世纪英国的土地保有状况以及保有条件、土地转让状况早期的劳动工资形式、城乡的阶级斗争等,我们对这些方面仍然知之甚少。不仅如此,财政史、宪政史、工业史、教会史等也需要重新考量。历史学家不能再囿于自己“一亩三分地”,马克思主

^①参见:L. C. Knight, *Drama and Society in the Age of Jonson*, Chatto & Windus, 1937; F. W. Bateson, *English Poetry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 The Clarendon Press, 1934.

义将整体性带入历史,乃是因为它能将真实的、鲜活的、努力着的、受难着的个人带到历史事件的中心,而不是仅强调作为观念与理性的抽象的人。

第四,始于文献,以史为鉴,将过去与现实连接起来。对英国资本主义兴起的研究与思考绝不是单纯地还原历史,而是需要以史为鉴,反观现实。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宗旨就是“以史为鉴”。《过去与现实》杂志是英国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阵地。“过去与现在”的意思就是:既在写过去,也在写现实。这是汤普森与希尔等人一直坚守的原则。希尔曾说:“我们所有的工作既是关乎过去,也是关乎现在。”^[14]马克思主义关于资产阶级革命的概念使1640年英国革命处于英国史的中心地位。对英国革命的正确认识可以解释英国社会的诸多现象,如:君主制与上院的存在、英国特有的议会主义思想、激进运动的英国和平传统等。这些都可以从英国革命那里找到合理的解释,而不是简单地将之归为神秘的“盎格鲁-撒克逊”传统。

最后,马克思主义历史分析方式是为了找回传统,而不是否定传统。从英国人对待本民族历史上的革命与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态度的转变可以看出,只有马克思主义方法才能让英国人找回自己的传统。比较起来,1789年的法国革命对法国意义深远,然而1640年英国革命却似乎对英国并无影响。雅各宾派至今仍然存在,而平等派却早已消失。清教主义理论只强调17世纪的英国人与现今英国人间的区别,将二者的政治斗争区别对待。马克思主义通过展现社会的整体性,再次鲜活地重现了政治的阶级基础与意识形态间的斗争历史。克伦威尔成了力量的联合体,令他的敌人毛骨悚然;弥尔顿是一个为弑君者辩护的伟大诗人;平等派第一次宣示了人民大众的最高权力;深耕派第一次将共产主义理想变成了一项政治运动,等等。一言以蔽之,英国共产党在1949年第一次唤醒了英国革命沉睡了300年的丰功伟绩,而马克思主义则将英国人的过去带到了当下。

参考文献:

- [1] GODFREY D. The Early Stuarts, 1603-1660[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49:3-7.
- [2] 李勇. 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宗教研究视阈[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5(2):155-160.
- [3] RICHARD H T. The Rise of the Gentry, 1558-1640[J].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994, 11(1):1-38.
- [4] RICHARD H T. 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M]. New Jersey: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8:5-17.
- [5] LAWRENCE S. State Control in Sixteenth Century England[J].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947, 17(2):103-120.
- [6] CHRISTOPHER H. The English Civil War interpreted by Marx and Engels[J]. Science & Society, 1948, 12(1):130-156.
- [7] 乔瑞金. 我们为什么需要研究英国的新马克思主义?[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1(6):101-115.
- [8] DAPHNE M. Study Guide to a People's History of England[M].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45:3-11.
- [9] RODNEY H. Feudalism and the Origins of Capitalism[J]. History Workshop, 1976, 1:9-25.
- [10] CHRISTOPHER H. Land in the English Revolution[J]. Science & Society, 1948, 13(1):22-49.
- [11] ALLEN M. The Revolution and the British Empire[J]. The Modern Quarterly, 1949, IV:57-72.
- [12] 李勇. 重审英国工业革命的科学基础[J].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2013(5):99-103.
- [13] 乔瑞金. 英国新左派的社会主义政治至善思想[J]. 中国社会科学, 2014(9):20-35.
- [14] CHRISTOPHER H. The English Bible and the Seventeenth-Century Revolution[M]. London: Penguin, 1993:iv.

(责任编辑 陶舒亚)